

论清代目录学

吴 杰 黄爱平

我国古典目录学源远流长，内容相当丰富。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定《别录》、《七略》，开创了群书目录之后，目录学就逐渐发展了起来。及至清代，特别是在乾嘉时期，随着考据学的兴盛，目录学由原来学术史的旁门别支转而成为当时学者士人几乎人人都要研习的必修之课，到达了它璀灿的鼎盛时期。

有清一代目录学的繁荣，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一、目录学受到普遍的重视。以往的目录学大都局限在书籍的整理、分类、编目等方面，而清人则把目录学视为入学的门径，读书的基础。所谓“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①“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②许多学者不仅深入研究目录学，而且亲自编制各种目录，甚至到了晚清，维新人士在学习西方，鼓吹变法之时，也要利用目录学来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二、目录学著作的数量急剧增加。据统计，从汉魏至明末，各种官撰私著目录，包括史志目录在内，共计151种，^③而有清一代各种目录著作就有156种，^④超出前此历代目录著作的总和，足见其数量之多。三、专科目录和特种目录大量出现。清代许多专门学科，如经学、史学、版本、金石、文字、宗教、戏曲、书画、历算等，都有独自の目录。为特定书籍所编的目录也屡见不鲜，如丛书、进呈书、禁书、译书，或者有关某人、某书、某一地区的资料，也都编有专门的目录。其种类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是历代所难以相比的。四、目录著作的编制水平明显提高。清代出现了一批有很高价值的目录著作，著名的《经义考》、《四库全书总目》、《天禄琳琅书目》、《隋书经籍志考证》等书，都以其收集之广或考证之精为后世所重。特别是《四库全书总目》，集众多著名学者之力，对以往典籍作了系统的清理和扼要的评论，至今仍是目录学领域最有影响的著作。

作为学术领域中的一个专门学科，目录学的发展，是与学术风气、学术思潮的演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清代学术发展的轮廓，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其基本特征诚如王国维所云：“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⑤即如主张凡学术史都应分成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个阶段的梁启超也说：“清学之蜕分期，同时即是衰落期也”，^⑥实际上也认为只有三个阶段。清代目录学与这一学术轨迹大致相应，可以分为清初、乾嘉、晚清三个时期，而以乾嘉时期为其发展的高峰。

(一)

清代初年的目录学，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发展阶段中。一方面，承明代目录学之衰，不可避免地沿袭了前代目录学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又与清初学风的转变相应，反映出某种求实、创新的倾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明代崇尚理学，学者好发宏论，且往往“以臆见考《诗》、《书》，以杜撰窜三传”，

①多有凿空之言。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心学盛行，学风日益空疏，学者大都“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②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显得比较空浮，“版本之学是不讲究的，学术源流也是不考察的”。③这种学风在目录学上也同样表现了出来。

明代目录学著作的数量并不为少，在类目的编排方面也有些新意，④但从总体上来说，这些目录著作大多编得比较粗糙，缺乏学术功力。如杨士奇主持编纂的国家图书目录《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为顺序，从“天”字至“往”字凡二十号五十橱，所录之书只注书名、册数，而无撰人、卷数，有的甚至连册数都不注，这实际上无异一本图书登记簿，难怪后人评论说：“如此著录，从来官撰私著所未有也”。⑤即或一些在明代算是较好的目录，诸如焦竑《国史经籍志》、陈第《世善堂书目》、祁承燾《澹生堂藏书目》等，也或著录不详，或考订不精，或归类不当，如果从目录学“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要求来看，它们都难以充分发挥介绍图书、明辨学术、指导阅读的作用。

一代学术或一门学科的发展，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始起步的，都不能不借鉴、利用前人的思想材料和学术成果。基础好自然起点高，反之亦然。清初目录学所能凭藉的历史遗存十分有限，明代以前的目录著作，除史志目录和专科目录尚有踪迹可见外，其余的群书目录大都已经亡佚。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是当时私家目录的代表作，被誉为“目录之冠”，但都久已失传，晁书至康熙末年始得以重刊行世，陈书则至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才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官修《崇文总目》和尤袤《遂初堂书目》也都“若存若亡，几希湮灭”。⑥因此，清初学者编纂目录，基本上只能参考明人的著作，这一时期的目录著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明代目录学的影响。如徐乾学的《传是楼书目》，系以千字文为顺序，可说是仿效《文渊阁书目》的结果。因此之故，明代目录著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清初也表现得比较突出。

一、目录分类比较混乱。古代目录的分类，大体包括部目分类、子目分类和小目分类三个层次，即所谓三级分类法。部目的分类虽有四分、五分、六分、七分、十二分数种，但自《隋书·经籍志》之后，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就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不按四部分类者也时有所出，如明代晁琬《晁氏宝文堂书目》、陈第《世善堂书目》，清初曹寅《楝亭书目》、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等。但这类书目实际上也未能跳出四部分类的窠臼，它们的独特之处只是在四部的基础上增设若干新的类目。因此，所谓目录分类比较混乱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子目的分类方面。

子目分类的难度较大，编目者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所以，历代目录著作的子目分类都有欠妥之处，明代更是如此。清初这一问题也未引起重视，一些书目在子目分类上表现出一种随意性，经不起推敲。如金檀《文瑞楼书目》，以四部顺序设置九十一个子目，已显繁杂。而按照体例要求，诗赋文章应该归入集部，但是书在子部又别立古文、骚赋诸类，收录《六朝文选注》、《宋文鉴》、《元文类》、《楚辞》、《离骚》这样的书籍。再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把语言文字之书析为字学、小学二类；子部已设农家类而又在史部别立种艺、豢养类，均欠妥当。此外，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钱曾《述古堂书目》、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等书，在子目的分类方面也都存在一些问题。

二、书籍归类多有不妥。按照设置的目类，根据每一部书籍的内容，将其归入相应之处，这是一项需要学识、功力的工作。编目者如果不能遍览群书，不详细了解书籍的内容，就无法胜任这项工作。要是目类设置不妥，就会给书籍的归类带来困难。在清初的目录著作

中,书籍归类多有不当之处。如钱谦益《绉云楼书目》把属于笔记野史的《梦梁录》列入编年史类,钱曾《述古堂书目》把字书《玉篇》、《龙龕手镜》归入韵书类,等等。此类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三、不重视书目题解。刘向父子首创群书目录时,为所录之书一一撰写题解,介绍作者情况、书籍内容及其源流演变,这就是以后章学诚所强调的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好的题解不仅可以反映书籍的基本情况,而且还能揭示一代学术的大致轮廓,对于保存图书和启迪后学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人们也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把目录学视为入学之门径的。但明代学风空疏,影响及于目录学领域,不少目录著作只载书名、卷数、撰人,成了仅仅“部次甲乙”的流水帐簿。清初目录学承明之弊,学者普遍不重视书目解题,许多目录著作没有题解,甚至对作者情况也不著一字,有的则只对一部分著录书籍略作注释,或记书有几册,或标作者名氏,缺乏系统和条理,起不到考辨学术、介绍图书的作用。还有的书目虽有题解,但错误甚多。如《读书敏求记》,对一部分书籍的版本讲得比较详细,有一定的价值。但在论述其它问题时,往往漏洞百出,或以伪作真,或张冠李戴,问题随处可见。诚如周中孚所评论,“大抵详于空言,而略于实际,间有考证,亦颇乖舛。”^③

清初的目录学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在传统目录学由衰转盛的发展过程中,依然处在一个重要阶段,起着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

明朝的灭亡,使封建士人受到了如同“天崩地解”的冲击,学者们在回首往事,总结教训的时候,往往把明末空谈心性的学风视为祸国误民的重要原因。为了改过纠弊,学术界开始提倡读书,崇尚实学,从而使学风逐渐由虚转实,由空返朴。与学风的转变相适应,清初的目录学也出现了一种求实的现象。有的学者不再满足于编纂簿录登记式的目录著作,而力图编出搜罗宏富,具有特色,能够指示学术门径的新作。朱彝尊的《经义考》即为其中的代表。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纂修《明史》,后为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九年辞官归里,潜心治学。他看到当时“谭经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遗编失传者十九,因仿鄱阳马氏《经籍考》而推广之,自周迄今,各疏其大略,微言虽绝,大义间存,编成《经义考》三百卷”。^④《经义考》是经部书籍的总汇,凡属经部之书,无论存亡散佚与否,全都著录在册。同时,它又广收序、跋及有关材料,一一胪列排次。全书分御注、敕撰、易、书等二十八类,先列书名,再注卷数、作者或注疏者姓名,然后说明存、佚、阙或未见,最后排列各种材料,内容博洽,体例严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虽然《经义考》也存在搜罗不全,材料不精等不足之处,但作为一部具有独创性的目录学著作,仍受到当时和后来学者的好评。毛奇龄谓“非博极群籍,不能有此”;^⑤陈廷敬说《经义考》问世之后,有关经部的书籍“存者固森然其毕具,而佚者亦绝其穿凿附会之端”,^⑥反映了学者们对是书的评价与推崇。

此外,《读书敏求记》专录宋元精刻之本,开善本书目之先河;梅文鼎的《勿庵历算书目》,首创历算书籍的专门目录;韩霖的《西士书目》,收录传教士的著译之书,这些目录学领域的创新之作,对以后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说,处在过渡时期的清初目录学,在扩大书目的种类,探讨书目的编例,发挥书目的作用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为乾嘉时期目录学的繁荣兴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

乾嘉时期是我国目录学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不仅目录著作的数量和种类都要超出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而且编目的体例更为严谨,水平明显提高,出现了一批具有很大影响的目录著作。

康熙中叶以后,清王朝的统治趋于稳定,经济逐步发展。安定富庶的社会环境,为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清统治者为进一步控制思想,巩固政权,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了“刽子手”和“牧师”的两手政策。一方面大兴文字狱,严厉打击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另一方面又大规模组织学者注释经书,编纂书籍,利用传统儒学笼络广大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学者只能埋首书斋,追寻古人,而不敢议论朝政,接触现实。于是,清初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朴实学风逐渐转向穷经考古一途,考据学蔚然成风,以至形成“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局面。目录学与考据学是相依相存的,因为无论鉴别古书的真伪抑或厘定史事的是非,都必须通晓目录之学。“不通目录,不知古书之存亡,一切伪撰抄取,张冠李戴之书,杂然滥收,淆乱耳目,此目录之学所以必时时勤考也”。^⑦社会的条件和学术的需要,促使目录学在这一时期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乾嘉目录学的兴盛,集中体现在目录学范围的扩大和目录著作水平的提高。

乾嘉时期,随着目录学的发展,目录著作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大,并延伸到各个具体学科和特殊区域,出现了一大批专科目录和特种目录。在专科目录方面,经部目录有翁方纲的《通志堂经解目录》、《经义考补证》;沈廷芳的《续经义考》;史部目录有章学诚的《史籍考》;史志目录有钱大昕的《补元史艺文志》,章宗源的《隋书经籍志考证》;版本目录有乾隆敕撰的《天禄琳琅书目》,孙星衍的《平津馆鉴藏记》;善本目录有黄丕烈的《求古居宋本书目》;金石目录有毕沅的《关中金石记》,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小学目录有谢启昆的《小学考》;书画目录有乾隆敕撰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戏曲目录有黄文旸的《曲海总目提要》;宗教目录有《大清重刻龙藏汇记》等。在特种目录方面,丛书目录有顾修的《汇刻书目初编》;进书目录有官撰的《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江苏采进遗书目录》;禁书目录有四库全书馆编定的《全毁书目·抽毁书目》,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抽毁书目》;地方书目有邢澍的《关右经籍志》;专人目录有王昶的《郑学书目考》;专书目录有全祖望的《读易别录》,等等。在乾嘉前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能出现如此众多而又独具特色的图书目录,可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

如果说目录学范围的扩大是就其广度而言,那么,目录著作的内容及其水平,则反映出一定时期目录学的深度。乾嘉时期不少目录著作都以其独具的特色和周详的考辨受到后世的好评,其中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影响的,当推《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是经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穷数年之力而编成的我国古代最大一部官修书目。它继承了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总结了自汉刘向、班固以来历代目录著作的得失利弊,以比较完善的分类体系和提要、小序俱全的著录方式,详细介绍、评介了《四库全书》所著录、存目的各种书籍,进而总结并反映了中国学术发展演变的情况。

《四库全书总目》收入书籍10,231种,计171,003卷,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每部之前

有总叙,扼要介绍各部的渊源流变。部目之下分子目,每目之前有小序,用以说明各目的概况。有的子目之下复分小类,最后著录书籍。每一种书都撰有题解,一一介绍作者生平,书籍内容,流传情况及价值高低。不明则考,不详则辩,多发前人所未发,显示出编著者深厚的学术根基。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评论是书:“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澁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⑩反映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内容特点和学术价值。

作为一部官修书目,《四库全书总目》自然要反映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要求,特别是对书籍的进退取舍,分类排列,以及议论评介,突出体现了统治者的阶级意志和价值取向。此外,在类目的设置、内容的考订以及某些书籍的归类等方面,《四库全书总目》也还存在一些问题。^⑪但所有这些缺陷和不足,都未能动摇它在古典目录学史上所占有的极为重要的地位。在此之后的目录著作,除孙星衍的《孙氏祠堂书目》等少数几种外,几乎都是根据《四库全书总目》划定的框架编定的。这种示范效应一直到近代西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之后才开始出现较大的变化。需要提到的是,最近有的学者不仅肯定了《四库全书总目》在目录学史乃至学术史上的作用和影响,而且强调其在思想史上也有其特殊而积极的意义,认为“十六至十九世纪四十年的中国思想界,一股波澜壮阔的社会思潮喷涌而出,它以反省既往,面向现实为基本精神,以‘崇实黜虚’为思想特征。诞生于十八世纪的《四库全书总目》挟带着这一时期中国士人的思想精粹,也投入到这一思想大潮中,为实现历史的转向而推波助澜”。^⑫这一见解,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四库全书总目》的作用及其价值。

乾嘉时期的目录学成就,还表现在这一时期的目录学理论也有了新的发展。乾嘉学者普遍重视对目录学理论的探讨,这是大量实践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在诸多的理论论述中,最为系统,也最具有代表性的,可以说是章学诚和他的《校雠通义》。

章学诚在目录学领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先后编纂过《天门县志·艺文志》、《和州志·艺文志》、《史籍考》三种书目。他认真总结经验,重视考察目录学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一、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目录学。章学诚认为目录学是在发展的,随着历代学术的变迁,目录学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传统目录学分类由七分法而到四分法,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的。所谓“《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⑬基于这样的认识,尽管他极为推崇《七略》,但仍认为“《七略》之古法终不可复”。^⑭

二、以史为中心,力图突破经史子集的界限。自四部分类法确立以后,经史子集四部一直界限明确,壁垒森严。特别是经部,因为收录的是儒家经典以及历代注经之作,所以历来位居其他各部之上。章学诚则提出“经部宜通”、“子部宜择”、“集部宜裁”的主张,^⑮认为经部之书实际上都是古代典章制度的记录,子部、集部中的部分书籍和篇章也同样如此,因此,都应该把它们视为史书。这一主张,与他在《文史通义》中所强调的“六经皆史”之说,是相辅相成的。

三、重视目录学揭示学术源流的作用。章学诚十分反对簿录登记式的编目方法,认为目录著作应该象《别录》、《七略》那样,有叙录,有题解。他批评主张不写题解的郑樵“删去《崇文》叙录,乃使观者如阅甲乙簿注,而更不识其讨论流别之义焉”。^⑯提出目录学必

须具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这八个字，至今仍然是编纂图书目录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

四、主张采用互著和别裁的编目方法。章学诚认为不少书籍的内容都不是单一的，所谓“理有互通，书有两用”，^②如果把一本涉及多方面内容的书硬性归入某一类，就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它的全部内容和价值。因此，他主张把这类书籍分别著录各个相应的类目，以助读者“即类求书，因书究学”。^③同时，他又认为一本书虽然可以归入某类，但如果书中有些篇目与他类互通，也应将这些篇目别裁而出，著录于他类之中。

章学诚的目录学理论，在古典目录学史上独树一帜。他以历史的眼光和丰富经验，对以往的目录学进行认真的总结和深入的分析，在目录学的性质、作用以及目录的分类、体例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章学诚尤其重视目录著作的体例，主张书目应该以严密的分类体系和完整的类序提要，来反映学术变化发展的历史轨迹。^④中国古代对目录学理论的系统研究，严格说来是从宋代郑樵开始的。但是元明中衰，除明代祁承燾在《庚申整书略》中对图书分类问题作了一些探索外，几乎没有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乾嘉时期的目录学家大多比较重视目录学理论的探讨，且有不少论述，章学诚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章学诚及其他目录学家对目录学理论的研究，起到了起衰振颓，继往开来的作用，不仅反映出乾嘉目录学的繁荣兴盛，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古典目录学理论的发展。

(三)

晚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使中华民族饱受欺凌蹂躏之苦。同时，伴随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近代文明，又对传统的封建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造成了近代中国新与旧，中与西的激烈斗争。这一斗争反映在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目录学这一专门学科也出现了新旧目录学并存的现象。传统目录学仍然存在并占据着统治地位，而新的目录学也逐渐开始发展起来。

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四库全书总目》是发展的一座高峰。从它问世之日起，就以其官修“钦定”的特殊身份，汇众书为一书的独特功用，集一代学术之精华的深厚功力，受到学者的普遍推崇，并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传统目录学领域，《四库全书总目》更是处于高高在上的独尊地位，成为学者竞相效仿的楷模。所谓“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总目》”。^⑤很多目录学家都唯马首是瞻，特别在分类方面，大都随《四库全书总目》亦步亦趋。嘉庆年间范懋柱所编《天一阁书目》，四部之下分四十四子目，基本上是沿袭《总目》的体例。晚清时期，许多目录学家仍视《总目》为令甲，鲜有越出其范围者。如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分类几乎与《总目》完全相同，只把集部的“词曲”类改作“乐府”类；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志》，也仅仅在子部中少“法家”一类。至于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志》等，则无论分类还是编排，都与《总目》完全一致了。

晚清时期的传统目录学，除在《四库全书总目》的示范效应下涌现出一批目录著作外，还在读书记和史志目录这两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读书记与一般读书笔记不同,它是作者在阅读时就书籍本身及其有关问题所作的记载、叙述或评论。这种读书记,人们都是作为目录著作来看待的。与藏书目录相比,读书记所录之书大都是作者仔细阅读过的,因而对于书籍的品评,也就显得更为详细。晚清的读书记,以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和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最为著名。

周中孚,字信之,号郑堂。他热衷于考据之学,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是“为学之涂径”,于是“遍求诸史艺文志,考自汉迄唐存佚各书”,^②又广泛涉猎宋以后特别是当时学者的著述,仿照《总目》体例,写了大量的书目题解,汇成《郑堂读书记》,收书四千余种。^③所作提要一部分取《总目》之成说,一部分为作者自己的心得,内容相当充实。由于《郑堂读书记》收入了许多《总目》以后新出之书,所以被学者称为“一定程度上起了《四库全书总目》续编的作用”。^④

李慈铭,字悉伯,号莼客。他二十岁开始写日记,一直坚持到晚年,中间只有短期的停辍。他的《越缦堂日记》中,有很多读书的心得,后人将这一部分辑出,成《越缦堂读书记》一书。《越缦堂读书记》与其它读书记的不同在于它是以日记的形式写的,所以缺乏系统和规范,有的篇章对某部书的作者、内容、优劣等情况都有记叙,有的则只述及某一方面。《汉书》的笔记是分三十次写的,字数达八、九千字,而《资治通鉴》的则只有数十字,差别很大。但李慈铭毕竟是一个有根柢的著名学者,对问题的分析往往是多方引证,触类旁通,颇有独特见解,因而有人认为是书的价值要比“同类著作如《郑堂读书记》为高”。^⑤

我国古代的目录著作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数量很少,而史志目录作为史书的一部分,能够随着史书的流传而被保存下来,成为后人研究古籍的重要材料。但在二十四史中,只有《汉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六史有《艺文(经籍)志》,而它们本身也有不少疏漏,因此,辑补、考证艺文(经籍)志,就引起了目录学家的兴趣。宋代王应麟著《汉书艺文志考证》,首开系统研究史志目录的先河。清初因纂修《明史》编订《明史·艺文志》,促使史志目录的增补活动逐渐兴起,乾嘉时期先后出现了钱大昕的《补元史艺文志》、钱大昭的《补续汉书艺文志》等一批史志目录。及至晚清,考订、增修史志目录达到高潮。《中国丛书综录》所收有关史志目录的著作计三十五种,其中有二十五种是晚清时期编纂的。这些著作可分为辑补和考订两类,前者是为没有艺文(经籍)志的史书补修艺文(经籍)志,或补充原有史志目录阙略的书目,后者则主要考证修订原有史志目录的外误疏漏。目录学家在浩瀚的书海中辑古钩沉,将爬梳出来的有关材料加以考辨、排比、归类,以反映古代典籍存佚流传的情况。在这些学者中间,以姚振宗的成就最为显著。

姚振宗,字海槎,家中富于藏书,精通目录之学,编有多种目录著作,其中史志目录计有《汉书艺文志拾补》、《汉书艺文志条理》、《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考证》五种。姚氏不但潜心编目,而且长于考证,他认为:“目录之学,言其粗则牒列书名,略次时代,亦不失其体裁;言其精则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各具渊源,版槧之古刻今雕,显有美恶,与夫纸墨优劣,字画精粗,古之人亦不废抉奥提纲,溯源竟委,盖实有校勘之学寓乎其中,而考证之学,且递推递密至无穷无尽也”。^⑥他在考证、编目实践中,始终贯穿这一思想,融考证于修志之中,所编艺文志收录宏富,内容精审,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地方志中的艺文志，也是史志目录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的方志十分发达。康熙十一年（1671）诏令各州县编辑方志，雍正七年（1729）又让各省府州县分别撰写地方志书，并限期完成，同时还规定以后每隔六十年修撰一次。这些规定对推动地方志的编写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各省、府、州、县几乎都有自己的方志，甚至一些镇也有了镇志。这些方志不少编有艺文志。《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和《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二编》收入清代编修的方志约3,500种，其中近三分之一是有艺文志的。^④方志艺文志专收一个地区所存书籍或一个地区历代人物的著述，其中常有为一般目录著作所不收者，是深入研究古代典籍的重要材料，值得引起重视，并予以充分发掘和利用。

正当清代目录学在传统学术的范围内继续发展之时，历史的巨变也影响到这一专门领域。伴随着近代社会的变革和西方文化的传播，反映这一新的历史特征的目录学也开始出现了。

洋务运动开展之后，为了学习西方的工艺技术，译书之风逐渐兴起。1867年，上海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主要选译西方科技书籍。1880年，受聘于翻译馆的英国传教士傅雅兰编写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一书，对翻译馆的成立始末以及译书的益处、方法等作了详细介绍，该书之后附有译书及出版目录。1889年，王韬编著《泰西著述考》，著录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翻译的书籍二百余种。这些书目的影响虽然十分有限，尚未能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它们的出现，无疑已经透露出近代学术变迁的信息。

戊戌维新时期，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巨大变革，传统目录学领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变化。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危难，严峻的现实，使先进的思想家认识到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科技等各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距。他们痛切地感到，只有使国人了解外国情况，学习西方长处，才能实现变法自强、富国富民的目的。为此，他们大量地向国内介绍外国书籍，从而为书籍的来源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与此相应，一批新的书目也相继问世，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也十分重视编纂书目。不过他们编目并不从学术着眼，而是要利用书目来宣扬变法，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

康有为首撰《日本书目志》，介绍日本近代书籍。他认为：“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机之末，而在其士人学新法之书”，所以，“今日欲自强，惟有译书而已”。但当时兼通中西文字的人太少，无法直接从西方大量翻译著作，只有借用日本的成果，因为“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而我国通日文的人又比较多，所以，康有为编撰此书，“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要书毕集矣”。^⑤梁启超也编了《西学书目表》和《东籍月旦》等书，他的目的与康有为一样，也在于救国富民，所谓“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士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⑥尽管康有为和梁启超所编的书目，其着眼点在于宣传维新思想，促进社会变革，但它们仍然以全新的内容和全新的分类，显示出晚清目录学的重要变化。

清代末年，随着学术的发展和新学的兴起，许多新书、译书相继出现，传统目录学的四部分类法已经无法适应学术发展的要求。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在编纂指导学生读书的《书目答问》时，就曾针对清代大量丛书问世的现象，仿效明代祁承燾的作法，在四部之外别立“丛书”一部。当然，这一五部分类法尽管有所创新，但毕竟未能摆脱传统的分类框架，没有把新兴的学科内容包括进来。而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出现的《日本书目志》和《西学书目表》等新的书目，则完全按照新的学科要求来收录书籍并加以分类。《西学书目表》分西学

诸书、西政诸书和杂类三部。“西学诸书”类收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西政诸书”类收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而一些难于归类的书籍则全部列于“杂类”。《日本书目志》分生理、理学、宗教、图史、政治、法律、农业、工业、商业、教育、文学、文字语言、美术、小说、兵书十五类，这与现代的图书分类法已经相当接近了。其后徐惟则的《东西学书录》、沈兆祯的《新学书目提要》等书，基本上都是按新的学科分类编纂的，显然受到维新派的影响。

张之洞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目录著作，反映了当时在目录学这一专门领域所存在的新学与旧学分立的倾向。《书目答问》专收传统书籍，因此可以遵循四部之法而略作调整；《日本书目志》和《西学书目表》只收外国书籍，所以能够置四部于不顾而设立全新的类目。但是这种彼此分立的著录方式和分类方法，并不能反映近代图书流传贮藏的全貌，这样，就需要一种能够把中外书籍合编为一的书目代之而起。徐树兰的《古越楼藏书记》在这方面作了尝试。是书把中外书籍集为一编，统一加以分类。全书分学部 and 政部两大类，下设48个子目，然后将中外书籍分别归于各类之下。如学部纵横学类，下分历朝纵横学派和东西洋纵横学派；法学类下分历朝法学派和东西洋法学派等等。凡标“历朝”者收中国书籍；而标“东西洋”者收日本和西方书籍。尽管这种分类法有把中外书籍简单加以类此之弊，并且用中国传统学术的概念来套用外国书籍，也难免会有牵强附会之处，然而它毕竟能够趋时而进，应需而变，融合中外，并存新旧，这在目录学的发展史上无疑有其积极意义。此外，黄庆澄的《普通学书目录》、杨复等人的《浙江藏书楼书目》诸书，把新旧之书分而为二，合于一编，先旧后新，互不相混，这也是为使目录学能反映现实的学术状况而作的探索。

清朝的灭亡，结束了封建的专制统治制度。政治、社会的急剧变化，又推进了学术的加速演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近代学术在我国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学术研究的内容、目的、方法都较以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此相应，作为传统学术领域的一个专门学科，古典目录学也失去了昔日的风采，面对相继出现的新学科和不断涌来的新书籍，它已经无能为力，难以适从了。新的目录学理论及其分类体系、编目方法逐渐占据上风，成为主体，从而使目录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①江藩：《经解入门》卷五。

②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

③参见汪辟疆：《目录学研究》。不过这一统计数字没有包括金石目录在内，实际上并不完全。

④按：这里的统计数字，主要依据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孙殿起《贩书偶记》和《贩书偶记续编》的材料。其中《贩书偶记》所收部分民国年间的目录著作不包括在内。此外，这一统计数字也未计金石目录，仅供参考。

⑤《观堂遗目》卷上《沈乙庵尚书七十寿言》。

⑥《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节。

⑦钱谦益：《赖古堂文选序》。

⑧全祖望：《鮑琦亭集·梨州先生神道碑文》卷十一。

⑨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41页。

⑩如祁承燾的《澹生堂藏书目》新增“丛书”一类，并在图书著录中采用“互见”之法。

⑪⑬⑭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

⑫《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五。

⑭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三，《寄礼部韩尚书书》。

⑮⑯见毛奇龄和陈廷敬分别撰写的《经义考序》。

⑰叶德辉：《郁园先生全书·藏书十约》。

⑱《四库提要辨证·序录》。

⑲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目录学成就与不足，详见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第十三章。

⑳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第26、27页。

㉑㉒《校雠通义·崇刘》。

㉓《校雠通义·自序》。

㉔《论修史籍考要略》。

㉕㉖《校雠通义·互著》。

㉗按：有的学者将乾嘉目录学者分为“义例”和“考据”两派，而以章学诚、全祖望为“义例”派的代表。参见李国新《论乾嘉目录学》，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㉘戴望：《外王父周先生述》，载《郑堂读书记》卷首。

㉙按：周中孚主要生活在乾、嘉、道时期。《郑堂读书记》则编定于道光年间，故而放在这一时期加以论述。

㉚来新夏：《古典目录学》第291页。

㉛《越缦堂读书记》卷首，《出版说明》。

㉜《师石山房书录·序》。

㉝按：方志中的艺文志，名目很不相同。有的称“艺文”，有的称“典籍”，有的称“经籍”、有的称“著述”；还有的仅有“金石”（或称“碑碣”）类，可视之为史志专科目录。以上各种，均作史志目录计。

㉞《日本书目志·序》。

㉟《西学书目表·序例》。